会党教门

历史与神话：天地会西鲁故事由来及天地会起源

孔祥涛

[摘要] 有关创教和起会的历史神话是我国民间教派和帮会共同的现象。合理解读这些神话，既是民间教派和帮会研究的任务，也是进一步探明民间教派和帮会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抓住“戏剧化”这一关键环节，对明清民间教派和帮会创教、起会历史神话中的“昏（君）奸（臣）与功（臣）”故事结构模式进行探讨，进而用天地会的历史解析其起会历史神话“西鲁故事”的形成过程，力求廓清笼罩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迷雾。

[关键词] 天地会　起源　历史　神话　戏剧化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5）-03-0070-09

History and Myth: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the Xilu Myth as well as the Origin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for both the folk sects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to be set up in virtue of myth. Therefore, to comprehend these myths profoundly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research of the folk sects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but also a key to open the door of their histories. Focusing on the key point of "dramatizing", this article mainly researches on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fatuous monarch and treacherous court official vs. the court official who has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in the myths of the founding of folk sec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forming of the Xilu Myth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us finds the answer to the origin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在民间教派和帮会身上，真实的历史与它们自创的历史神话故事传说（即“虚构”的历史）往往是合为一体的，清代八卦教是这样，青帮[①]和天地会也是这样。这些历史神话故事传说，是民间教派和帮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它们，就难以透彻认识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精神世界；而反过来，民间教派和帮会自身的历史又是其历史神话故事传说的基础，这些历史神话故事传说不但是在民间教派和帮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还以“影射”的形式曲折反映了民间教派和帮会的历史。如不充分依靠民间教派和帮会的“真实”历史，就难以拨开这些神话造成的迷雾，揭开民间教派和帮会起源的真相，甚至会在研究中被引入误区。因此，在研究中，必须用民间秘密结社“真实”的历史来解剖和解说这些神话，并反过来用这些神话来透视、“发现”和“还原”其“真实”的历史。而解析这些历史神话故事，又需要注意到民间文学艺术对秘密结社的熏染以及民间秘密结社对民间文学艺

[收稿日期] 2004-10-20
[作者简介] 孔祥涛（1964—），男，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北京 100741

术特别是大众化戏剧的模仿。

一、八卦教创教神话故事中的“昏（君）奸（臣）与功（臣）”戏剧化模式

八卦教是清代华北最有影响的民间教派之一，其分支离卦教内部有一个历史神话传说，主要内容是：

明朝天启年间，“收元祖”李廷玉下红尘度众生，在河南收下郜皇代等八大弟子。到了清朝顺治年间，“火帝真君”吴三桂造反，朝中文武大臣没有人能抵挡，形势十分危急。“直逼得，老顺治，无计可使；出圣旨，传皇榜，要选能人”。李廷玉师徒九人揭了皇榜，在王子带领下，迎战吴三桂。夜深人静之时，李廷玉孤身一人到敌营劝吴三桂投降。吴三桂说：

> 胡儿们，中原难占；廷玉说，是天意，二百余春。吴王说，二百年，何人造就；有几朝，有几帝，几辈乾坤？廷玉说，大清家，七长八短；二百年，有余零，同治换新。吴王说，久以后，何人来立？二治对，才该你，再下红尘。直说得，三宫桂，无以答对；我今日，不求道，再待何辰？那吴王，跪在地，晚间求道；先天佛，把功夫，阴阳细分。点罢功，讲罢道，定下一计；那吴王，修大道，不争乾坤。师徒分，吴王的，人马就退；他九人，转回营，得功之臣。

李廷玉师徒九人平定了吴三桂叛乱，班师还朝。顺治帝龙心大喜，要给他们封官加爵。但李廷玉表示不愿当官，只愿传道度人。顺治帝很受感动，修下大寺和说法亭，请李廷玉前去说法。李廷玉在说法亭上昼夜说法，直说得顺治帝动了善心，特许他一十三省传教。满朝文武大臣都拜李廷玉为师，甚至连顺治帝也“跪求大道”，放弃江山不做，修行成佛。

到了康熙年间，李廷玉的教门有了很大发展：“普天下，十三省，都有善缘”，“满乾坤，认活佛，名叫奉天。”可是，李廷玉的徒弟洪亮，因为官正直得罪了朝中八大公和薛三。这几个奸臣接连上本，参李廷玉是“外道妖仙”，说郜皇代有谋反之心。康熙帝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李廷玉退吴立过大功，修性命不争江山。但是奸臣们说：吴王造反时，朝中兵多将广都抵挡不住，而李廷玉只师徒九人，不用一刀一枪，一上阵就大败吴王，回朝后还诓去老主顺治。如今其妖道传遍天下，人多势众，而朝中人虽多武艺却不就，一旦李廷玉生反心，没有人能够制止。还不如借为他们传道“庆功”之名，设毒宴把他们斩草除根。奸臣们说得康熙帝哑口无言，无奈何出圣旨，诓骗李廷玉师徒九人到说法亭赴宴论道，暗中却在酒中下了致命的毒药。

李廷玉到说法亭后，凭慧眼识破了奸臣们的阴谋。弟子们听了气愤万分：表示要起手造反，推倒大清，拿住八大公、薛三，杀了“小康熙”，明传大道。危难之际，李廷玉上云盘求无生老母指示，这才知道：“今日里，就该咱，师徒归位；只留下，郜皇代，一人收元。”他封离卦教教主郜皇代为八卦总领，并说二百多年后自己还将转世，落在燕南赵北三宫宝地李门，改天换地变人间，推翻清朝，灭尽恶人，执掌乾坤。“讲罢话，又听的，上方呼唤；师徒们，哭一场，就要宾天。李廷玉，回家銮，康熙年间；说法亭，一杯酒，三月初三。一杯酒，他八人，用在腹内；一齐的，归位走，宾了圣天。郜皇代，他一见，大家归位；分身法，逃出去，暗把道传”[②]。

吴三桂造反实为康熙十二年始，八年后被平息。笔者研究表明，这个创教神话故事大约清朝嘉庆年间始出现在离卦教内。故事的创作者在对八卦教历史素材的加工处理中，进行了时间、地点、场景、人物、情节的剪接、组合、虚构、浓缩。把历史上的离卦教主郜文生（即“郜皇代”）直接作为历史上八卦教教祖刘佐臣（即“李廷玉”）的弟子，以彰显郜文生后传；把所谓的平叛立功按在吴三桂之乱上，演绎出平吴故事，以增强时代感和真实性；把平吴立功放在顺治时期，以免与受康熙镇压的说法不一致；标榜所传为孔孟大道，以申明教派自身的正统性；渲染李廷玉神力之大、获顺治帝彰扬并皈依，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又因刘

佐臣实死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被清政府戮尸，故托言于康熙年间被清政府陷害屈死；揭露八大公、薛三挟私报复和康熙君臣惧怕民间教派危及君主统治的“真相”和实质，以表明所受冤屈；借用民间文学和戏剧中岳飞父子丧命风波亭、朱元璋设宴火烧庆功楼、宋徽宗赐毒酒杀宋江、李逵的情节，编出说法亭设毒筵害功臣，以师徒八人之惨死打动人心，引起不平和共鸣；结尾以郜皇代受天命脱逃、神谕八卦教终会翻身掌乾坤，在人们心中留下火种。

故事作者的这种“戏剧化”努力是成功的。翻阅清后期离卦教的有关档案史料和教内口传历史材料，不止一处可以看到，该故事成为信徒们心中的“正史”、“信史”。尽管杀戮不断，“苦难”漫无尽头，教首信徒们却从此获得启示、信心与动力，顽固持教。离卦教历史神话故事的这种精神力量，令不止一代人惊异！[3]

奸臣当道，蒙蔽君王，昏君助奸，功臣、忠臣被奸臣所害，蒙冤屈死，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清通俗文学艺术（白话小说、戏曲）中，最能打动人心，引起痛惜、同情、不平，最能寄托人们爱憎情感和清明政治希望，因而也最广为一般老百姓所熟知、所喜闻乐见的题材，具体故事数不胜数。反映屠戮开国功臣的有汉代吕后杀韩信、明代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等。宋元明清时期，受当时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现状影响，还有相当一些通俗文学艺术作品，讲述忠臣抗击外邦入侵或平定内乱、保国有功、反被奸臣昏君所害的历史故事，如唐武则天迫害征西有功的薛仁贵[4]，北宋潘仁美迫害抗辽功臣杨家将[5]、庞相国迫害抗西辽功臣狄青[6]，南宋高俅迫害平方腊功臣宋江、李逵[7]，秦桧迫害抗金功臣岳飞[8]等。这类“昏（君）奸（臣）与功（臣）”故事，在情节上一般有着如下相同的模式：外邦入侵或内部叛乱，朝廷危机；忠臣挺身而出，凭盖世武功或神助，平定外患或叛乱，解国家于倒悬，建立奇功；功高震主，引起圣怒，或招致奸臣嫉妒，挟私陷害，蒙蔽君王，强加罪名，致功臣含冤入狱或惨死；昏君幡然醒悟或明君出现，真相大白，正义伸张，奸臣被除，忠臣获平反昭雪，万古扬名，忠臣之后封官赐爵，执理朝纲，相伴天子，护国佑民，共享太平。

明清时期，各类地方戏剧是乡村最普遍和受欢迎的文娱方式之一。普通民众能识字阅读的并不多，听戏是他们了解历史和乡村娱乐的重要渠道。除讲述“昏（君）奸（臣）与功（臣）”历史故事的小说因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的宣讲而为普通民众所耳熟能详，同类历史题材的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地方戏曲和评话[9]，也在集市、庙会、婚丧嫁娶、年节、宗族祭祖等场合，经民间艺人、戏班走乡串村、年复一年的表演弹唱，变得妇孺皆知。这样，历代“昏（君）奸（臣）与功（臣）”历史故事为智识不高、近乎全是文盲的农民群众所津津乐道、辗转传述，牢牢扎根于他们的精神文化世界。这种戏剧化的历史故事，不仅在乡村社会中发挥娱乐功能，而且以艺术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和褒贬形式发挥教化熏染作用，充当了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的“历史教科书”和政治价值（忠奸、是非、善恶、正邪）判断的“教员”。他们不断从中寻找启示，并加以模仿，在现实的社会舞台上各自进行宗教、社会或政治的“表演”。如同在地方戏剧表演中，观众将编剧依据历史题材“虚构”的历史作为信史看待一样，民间教派和帮会的信徒、成员们也将其内部“虚构”的创教、起会历史，作为他们心中“真实”的历史。这是十分有趣的民间文化现象。

二、天地会西鲁故事对“昏（君）奸（臣）与功（臣）”戏剧化结构的模仿

在明清民间结社中，受民间戏剧和传奇小说启迪，首先模仿“昏（君）奸（臣）与功（臣）”结构，通过“戏剧化”进行历史神话故事传说创作的，并不是离卦教，而且也并不止民间教派。创立于明中叶的罗教作了较早的尝试。康熙二十一年刊印成书的罗教分支大乘教经卷《三祖行脚因由宝卷》中有罗教创始人罗祖退番兵反受冤狱的故事：

明代，外国有一十万八千红毛鞑子攻至北京城下，明军难以抵挡。锦衣卫总都三更时梦见北京有一真人，一身紫气腾腾，毫光显现，

云可救危难。次日，遂带众军兵各执五分真香迎接，果见一军人如梦中像，此系罗祖。总都央求罗祖师“发大慈悲，助朝廷一阵”。罗祖带众军兵上阵。番军见罗祖神像，心惊胆战。“祖师向前张起弓箭，连射三枝。番兵看见三朵莲花空中而下，竟带兵马回转本国。此朝稳镇”。罗祖三箭退了十万番兵。皇帝听知罗祖如此神通后，“胆战心惊不非轻”，“仔细思量起，不容这等人”。遂设计陷害，要罗祖当场射箭观看，诈言重赏。果见罗祖有此神通，心头大怒，要斩罗祖。文武百官解上法场监斩，不想钢刀自断，又押送监牢。“君王吩咐众臣听，长枷铁锁不离身。吩咐牢官断水饭，与我饿死这般人。”罗祖在牢中忍辱受苦，吐出五部经卷。皇帝看经后，宣上殿讲经，见倒背如流，知此人非凡，更怕其谋逆，又惊又气，不容他在世，一心要治其重罪，永禁牢中。众徒见状纷纷落泪。罗祖坚信“有朝一日光明现，佛力神通救我身”。七个番僧以讲识古铜佛玄机为由，向明帝索要北京，逼明朝自认下邦。明朝文武大臣、众僧道人皆莫能晓，只好请罗祖出马。罗祖再显神通辩折番僧，化险为夷。皇帝龙颜欢喜，封罗祖为“无为宗师”，发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颁行天下，裨道法普传人间。⑩

成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的秘密帮会天地会，也采用了这一戏剧化模式，编造了西鲁故事，讲述其起会始末，梗概如下：

> 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进攻清国。清朝损兵折将，无法克敌。康熙帝张榜求贤，许以征得西鲁者，封万代公侯。甘肃省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揭榜，出征平定西鲁，未用朝廷一兵一卒。康熙帝大喜，命满朝百官十里长亭相迎入朝，欲封官职。众僧表示不愿为官，愿回寺修行。康熙帝御驾亲送。众僧回少林诵经、说法、修道。
>
> 有奸臣因素与少林寺僧人不和，设计陷害，上本诬称少林寺僧教授法术，如狼似虎，倘有异心，江山难保，若不早图，必生后患。皇帝惊恐问计。奸臣出谋，赐毒酒于僧人表重赏，再用硝磺等放火烧毁寺庙，以绝祸根。昏君听信奸臣所言，派官兵趁夜放火，一百一十僧人葬身火海。只剩十八人，被神救出。
>
> 奸臣闻知有人逃走，领兵追赶。寺僧逃亡途中，又有人饿死，只剩师尊洪二和尚万提起（喜）即万云龙等师徒六人。行至长沙、汉口，见水面上浮起一重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灭清”四字，知系天意，遂在香炉前当天盟誓，反清复明。他们聚集人众，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傅为大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阵亡。众兄弟共扶崇祯西宫娘娘李神妃所生小主[11]……

这个故事是天地会起源说中“康熙说”、“雍正说”的主要论据。

显然，罗祖故事模仿了“昏（君）奸（臣）与功（臣）”戏剧化故事的结构。罗祖三箭退十万鞑子兵的情节乃是唐代薛仁贵征西三箭定天山（“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情节的移植，只不过将薛仁贵换成了曾经当过戍边军丁的罗祖，将对手西域突厥换成了明代北边大敌蒙古族鞑靼部而已。这一故事后来被清代信仰罗教的江浙漕运水手帮会及其衍生出的青帮所沿袭改动，如说罗祖是甘肃人，明嘉靖年间平定土鲁番后，为奸臣严嵩诬陷打入天牢等。[12]

西鲁故事大致采纳了“昏（君）奸（臣）与功（臣）”戏剧化结构。火烧少林寺情节乃是对明代朱元璋火烧庆功楼传说的模仿。凑成一百零八人结拜的情节，当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结拜兄弟的翻板。至于平西鲁番，很可能是对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清政府的重要军事行动——平定西域回部大小和卓在喀什噶尔叛乱——的附会（时吐鲁番为清军军屯重地，天地会讹念为“西鲁番”），也可能是对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明政府与占据吐鲁番的叶尔羌汗国满速尔为争夺东西交通要冲哈密而展开的长期军事斗争的附会，或对清顺治六年清政府平定叶尔羌汗国属下吐鲁番叛乱（吐鲁番当时臣贡于清朝）的附会。[13]万提喜等僧人受奸臣、昏君迫害，只少数几个人幸免死亡，而后受天启示，发动反清起义，乃是对乾隆三十三年、三十五年万提喜带领天地会徒众结盟进行

反清起义，遭清政府镇压的“倒果为因”式的影射。

仔细比较罗祖故事、李廷玉故事、西鲁故事，不难发现，三者有不少相同之处：(1) 因外敌入侵或内乱，朝廷面临无法克服的军事危机；(2) 民间僧道人物出而挽救危机，建立大功，成为功臣；(3) 君王封赏，辞而不受；(4) 昏君、奸臣陷害，功臣蒙冤。这种巧合，除了与它们相同受到“昏（君）奸（臣）与功（臣）”结构的戏曲、小说故事影响外，恐怕还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罗教于明成化年间产生于北直隶，不久遍传直隶、山东，对后起的许多教派都有重大影响。它的支派大乘教、南无教在明末清初遍传华北，对八卦教的创立很可能有所影响。嘉庆年间，直鲁一带“郜文生——刘功系”离卦教中有不少人读大乘教的经卷《扫心经》、《龙华经》及护道榜文等，嘉道年间还产生了离卦教与大乘教融合而成的新教派如孙维俭大乘教、周添明一字门教等。[14]在江南，明嘉靖年间罗教分支姚文宇等系大乘教既已广泛传播。江浙漕运水手所信罗教支派也在浙江等地流传。据乾隆四十五年福建巡抚奏，建宁县收缴罗教经书内有罗祖《护道真言》抄本，“内妄行编造崇祯年间罗祖被拿，斟问时有‘大地山河化夷土’之句”[15]。又据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奏，查获罗教经书《护道榜文》、《红炉接续》和《五公尊经》，内《红炉接续》一本，“所载崇祯年间，罗祖被拿斟问及大地山河之句，俱与闽省来咨所称《护道真言》内语意相同，但经名各异”[16]。可见，清代乾隆年间罗祖故事在江南既已广泛流传。离卦教、天地会都在罗教（大乘教）盛行的区域内活动，受其熏染必不可免。李廷玉故事的原形——平定回部的李廷玉故事[17]和天地会西鲁番故事，在形成过程中很可能直接受到罗祖平番故事的影响。

另一方面，三个故事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表现在结尾上，罗祖故事是个君臣和好的大团圆结局，而李廷玉故事和西鲁番故事则与罗祖故事不同，结尾是个反君、灭君的结局。前一结局，反映了罗教在政权镇压下依附官方、期冀获得合法地位的企图，表现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和教派性格的平和特色。从时代背景来说，这也与康熙朝以前罗教基本上置身于反政府斗争之外，且罗祖神话故事形成于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康熙年间有关。后一结局，则反映了离卦教和天地会在清朝镇压下不甘屈服，与当局不共戴天的叛逆精神，表现出政治上的不妥协性和其性格的极端激烈特色。离卦教历史神话与天地会历史神话之所以有这种一致性，从社会原因上讲，二者同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作为“邪教”和“邪会”在乾隆年间都受到清政府镇压[18]，它们的历史神话同样形成于反清斗争过程中[19]，并反映了下层民众反对清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愿望。二者均将受害日期定在康熙年间、共同表达反清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稍不同的是，从反映民族主义情绪而言，李廷玉故事虽也有指斥“胡儿们”的话，但复明色彩不如西鲁故事更浓，它提出由自家教主“刘（李）姓”坐江山，而西鲁故事则打出“朱明”旗帜，提出反清复明、扶明裔作皇帝。这种差别，反映了八卦教作为民间宗教所持社会历史观、救世论中的自我中心论与乾隆二十六年前闽粤台等省会党以“反清复明”为旗号进行反清斗争所分别造成的不同影响。从反清方面讲，李廷玉故事走得更远，它以乐观主义态度预言了清朝灭亡的“必然”命运，并以“神谕”形式确定了其“即将”灭亡的日期。从神话色彩讲，李廷玉故事宗教气氛更浓一些。从文学性来讲，李廷玉故事的情节、叙述方法、语言都完美、艺术得多，而西鲁故事则多有欠缺，如它未能一线贯穿、突出万提喜这个主角等。李廷玉故事的这些优点，得益于历史悠久的民间教派文化传统（包括宗教思想、宝卷艺术等）；而西鲁故事的相对不足，则与天地会受民间教派文化传统影响较少、天地会处于幼稚阶段有关。

三、乾隆年间天地会起义与西鲁故事的形成

蔡少卿教授根据清档案史料所载乾隆年间天地会案的官方办案记录，最早提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20]秦宝琦教授根据清代官方档案、天地会秘籍和实地调查进行研究，进一步证明天地会创于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为

福建漳浦县高溪乡高塘村人郑开。郑开起初在本村寅钱寺为僧，后至高溪村观音亭为僧。他生于康熙五十八九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曾名“涂喜”、“提喜”，道号“云龙”，又号“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中，“洪”、“万”同音，故又称作“万和尚”，“万云龙”。乾隆二十七年，万提喜传徒卢茂、方劝，方劝转传陈彪。乾隆四十四年，万提喜传子行义，同年病故。乾隆四十七年陈彪转传严烟，次年严烟将天地会传入台湾。[21]

万提喜在成立天地会后的第六个年头即谋划反清起义，由卢茂招聚 332 人，“捏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相号召”。起义失败，33 人在起义中被杀，参与者和受牵连者共 278 人被捕。卢茂等 3 人被凌迟处死，39 人斩立决，215 人杖一百、流三千，流徙乌喇地方。[22] 万提喜之弟郑答怕受连累，逃往台湾。万提喜在徒众掩护下未被官方查出。“卢茂等于三十二年起意纠集同会匪徒谋叛，陈彪系何哲邀赵明德入伙。因卢茂等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避。而僧提喜则系暗中指使，不露姓名”，“该犯又编出‘木立斗世’等字为三十二年起会之根，实属可恶”[23]。可见，万提喜是三十二年聚会起义的总策划者。据万提喜后代对秦宝琦教授讲，万提喜结会想当皇帝。“木立斗世”诗全句为：“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木立斗世”与“顺天行道”相并列，乃是万提喜在策划起义阶段，习谶纬预言之故技，以“世”字暗含乾隆朝应结束于是年（“木”、“立”、“斗”各暗含顺、康、雍在位年数），号召徒众应“天命”、行“天道”，反清灭清。后来此句留传下来，被徒众理解为暗含天地会立会时间是乾隆三十二年。实际上，“三十二年起会”本意系指卢茂聚会结盟商谋叛乱，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指创立天地会时间，因为同一奏折中已言明“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

乾隆三十五年，在万提喜策划下，李少敏与蔡乌强纠众结盟，试图起义。李少敏编造出“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开始打出“反清复明”旗帜。事泄，李少敏、蔡乌强俱被捕杀。万提喜与弟子陈彪隐匿各处，“不敢复行传会”。乾隆四十四年，万提喜病故。

姚大羔本的西鲁故事提到万提喜师尊为首结盟，进行反清复明起义，但未言万提喜战死。这说明西鲁传说最早酝酿于万提喜所主持的反清复明起义期间，即李少敏起义之后至万提喜死去这段时间，亦即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之间。乾隆四十七年入会的万提喜三传弟子严烟，于乾隆五十三年称：他曾听提喜二传大弟子、乾隆四十七年接续传会的陈彪讲：“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哪里，实不知道。”[24]“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总称。至二房上加增洪字，及用洪字作暗号，陈彪说都是朱、李二家传下来的。”[25]“纠集和尚四十八人……后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这段话，显然系西鲁故事中“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逃出十三僧”这一情节的萌芽。乾隆五十三年，官府拿获陈丕、陈彪、行义等，均准确供出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及其僧俗名字号和籍贯住址。据陈彪供：“其传与严烟诗句，供称得自提喜口传，实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是远省有法术的，实在不知真假。”[26] 由此推知，前述严烟所供天地会起会历史传说始出自万提喜之口。联系卢茂起义后天地会遭捕杀的形势和万提喜再次策划李少敏起义、捏称朱明后裔名称的背景，可以推知，“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李朱洪”乃是万提喜等人为了组织策划第二次起义所编造。实际上，在李少敏起义中，并没有什么“朱振兴”参与。按字义，“朱鼎元”与“朱振兴”应系指同一虚构之人，即捏称的朱明后裔的名称。“桃元”应为“桃园结义”中的“桃园”，在口耳相传中，因文化粗浅误解成了人名。

口供中说朱鼎元、桃元、马九龙等系有法术的远省之人，天地会传自川内，万提喜本人是马九龙手下分头传教十三人之一，在广东起会（清初有十三省，十三人可能意指每省一

人）等，亦系万提喜捏造，主要用来表示自己教门有来历、全国各省有同伙“高人”相助，并有朱明后裔作领袖，这样一方面可借以提高号召力，另一方面兼有避开创会人真实姓名，隐蔽真实传会地点，以备不测之时迷惑官方，逃脱重惩之意。此外，万提喜是位有粗浅文化、习武出身的僧人，他深知谶纬预言力量并善于以类似手法鼓动徒众。他有可能沿用“昏(君) 奸 (臣) 与功 (臣)”戏剧模式，附会唐初少林寺十三棍僧帮助秦王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立功而不肯受奖的事迹[27]，假称原系马九龙为首、有功于清朝反受迫害、逃脱官兵追杀的十三僧人之一，以功臣受冤之虚构故事引发会众不平之心，为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造理论依据，达到激励斗志、师出有名的目的。在严烟口供中，陈彪、严烟辗转口传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后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的说法，就可能是对万提喜所附会口传的创会故事的不完全复述。嘉庆二年已在福建流传的一份天地会传会花帖，证实了这一推测：“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都太平府太平寨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传下四字……再传授到广东惠州府高溪，兄弟议论，开设五房……二房在高溪……分为五处，再传下四字，木立斗世。五房兄弟商议，传下顺天行道四字。”[28]“二房在高溪”之前的话，与严烟供同，显然同出自万提喜之口，只不过口气由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省略了万提喜捏造的所谓“马九龙四十八僧”、“十三僧”前史这一铺垫，直接把该会老根万提喜抬出来。“木立斗世”、“顺天行道”八字，实系对万提喜策划乾隆三十五年李少敏起义之事的追溯。所言五房中“二房在高溪”，因万提喜又叫洪二和尚，故本当系指万提喜本人。策划乾隆三十五年起义时，万提喜有诗：“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李朱洪”。“三姓”本指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此处指李、朱、洪，“九龙升天”本言结会的壮志或异志，“李”本指李少敏、“朱”本指虚捏的朱明后裔朱鼎元，“洪”是自指。“万”与“洪”同音，仍系自指，“结万”即“结洪”，隐指结义拜把以万提喜本人为中心。但在向徒众诠释时，万提喜可能作了另一番解释，附会出如严烟前面所供的创会“前史”，即谎称“十三僧”中有五人结拜兄弟，自己为“二房”，其余为诗中所藏九龙、李、朱、桃，以致陈彪、严烟等会中人认为万提喜到广东立会时真有五姓兄弟（僧人）：马九龙、李少敏、朱鼎元、桃实、万和尚（洪二和尚），并相信天地会最早起自川内李、朱二姓，万提喜系十八人中传会广东之人等。据档案记载，陈彪自万提喜创会第二年起即跟随传会，直到万提喜死亡；行义是万提喜亲生儿子和亲传弟子，二人均称万提喜为“洪二和尚”。可见万提喜生前以“二房”自居。因此，万提喜生前编造五僧拜盟、分立五房的传说是很可能的。

口头传说在辗转流传中，常常发生讹误，并经增减，逐步完善。严烟于乾隆四十七年入会，他所供万提喜口传的起会史，当系乾隆三十二年后至四十七年前这段时间的口头传说状态，即西鲁故事的原始状态（姑且称之西鲁故事“第一形态”）。嘉庆二年既已流传的传会花帖内的文字传说，情节不连贯，显然是对口头传说的简要记录，当系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二年的传说状态（姑且称之为西鲁故事“第二形态”），与前者相比，删去了万提喜捏称的马九龙、朱鼎元、李、桃四姓，提高和突出了万提喜的地位，并将五房名字作了部分改动，将万提喜从五房中拔出来作为了祖师。嘉庆十六年发现的姚大羔抄本，可视作嘉庆二年至十六年的文字传说形态（姑且称之为西鲁故事“第三形态”），它继承了“第二形态”传说中对“第一形态”进行的变动，并继续加以改动。即删去了“当年起义在四川”、“成都”等“第二形态”未删净的尾巴，把“第一形态”中原“四十八和尚”，改成了“一百二十八僧”，继承了“第一形态”的“十八僧”和“第二形态”对万提喜的突出，将“第一形态”中的万提喜“五僧”改为万提喜师徒“六僧”。保留了“第一形态”对朱明后裔的崇奉，但附增上朱明后裔即“小主”身世的文字，还保留了“第二形态”的“五房”说法，并对部分名字作了调整、补充。从“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洪（两个洪字，暗指洪二——引者注）；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赤泪；四房桃必达”这段传说中，仍可见“第一形态”所言五房中洪

二和尚、李少敏、桃元这三房的痕迹。此外，“第三形态”增加了一百零八人结义、万提喜战死、五兄弟保小主等情节，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详细描述了万提喜等所谓“少林寺僧”在康熙时平定西鲁番作乱，反遭奸臣追赶迫害，受天启示结义反清复明的情节。嘉庆十六年以后各形态的西鲁番故事就是在“第三形态”基础上，经不断附会而成的。

秦宝琦教授认为本文所言“第三形态”乃是西鲁故事的诞生，笔者以为不然。从严烟口供和乾隆三十五年李少敏起义档案史料中可看出，万提喜是一位有头脑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在借“十三僧”故事煽惑众人起义时，他已借用朱明后裔旗号晓之以理，号召会众“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河山。由此推测，他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借用戏曲的“昏（君）奸（臣）与功（臣）”结构附会“十三棍僧”故事、罗祖退番兵故事、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故事等，进行有感染力的鼓动，对会众动之以情，“报火烧少林寺之仇”。否则，附会唐代“十三僧”故事就没有什么煽动力，说马和尚纠合四十八僧、死剩十三僧也没什么意义。只不过万提喜当年的叙述未必如姚大羔本西鲁故事那般“丰满”罢了（再后的抄本传说附会更多，更不足为信）。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清朝两次大规模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回部叛乱。万提喜在筹划第一次起义失败后，接着筹划第二次起义时，完全可能附会此事，将受官府镇压后准备再次起义的“叛逆者”，打扮成受官府迫害的“功臣”，将叛逆活动说成讨伐昏君奸臣、报仇洗冤的正义行动，以达到师出有名的目的。因其处乾隆年间，若捏说乾隆年间平西鲁番故事，众人自然不会相信，所以只好推到大家都没经历过的朝代，另一方面，若把事情嫁接到遥远的过去如顺治朝或明末，又易产生时过境迁的隔世之感，难引起会众切肤之恨，达不到纠众为自己报“少林之仇”的目的。所以，他选中了已过去但又不太久远的康熙朝。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论述天地会创立时说：“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29]创会人“必也以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推断与本文的上述分析似有相符之处。

四、结语

戏剧与民间兄弟会起源有着不解之缘。康雍时期，江南、东南地区民间结盟拜会时，常伴以“演戏”[30]，并摹仿《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和结义情节。天地会自然也不例外。[31]有关天地会起会历史的西鲁故事，当是万提喜及其追随者使用“昏（君）奸（臣）与功（臣）”戏剧化结构，对天地会早期历史加以附会，进行“再创造”的“戏剧作品”。该“戏剧”预期酬谢和娱悦的受众是前来结盟拜会的“兄弟”，如同当地民间结盟拜会时通常要“演戏”一样，只是在秘密活动状态下天地会的这场“戏”不能公开“表演”而已。

由于天地会起会故事是戏剧化的、出于特殊目的附会而成的，所以不能当信史看待，不能以之为依据推断天地会的起源。否则，缘此探索，有可能误入歧途。有关天地会起源的“康熙甲寅说”和“雍正甲寅说”，困境也许就在这里。同样，研究八卦教起源时，也不能将李廷玉传说看作信史，在这一点上，二者道理是一样的。

推而广之，在中国秘密结社研究中，对待此类受民间文学艺术影响、按照戏剧化模式经层层编造附会而成的历史神话故事传说，应像顾颉刚对待古史传说一样，层层考辨，剥去附会，揭出真相，而不能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入死胡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民间教派和帮会的这些历史神话故事传说借用了当时民众所欢迎的通俗文学艺术形式，融合了民众所熟悉的民间文化，包含了教派信徒和帮会成员特有的宗教、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反映了他们的情感、愿望、追求和价值判断，间接地表达了社会上一般民众的心声，所以一经产生，就被教派、帮会内部奉为

精神财富，起着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团体认同感、激励徒众反抗外部世界等方面的作用。教派、帮会历史神话故事传说的形成、作用以及它们与俗文学的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应是深化明清民间秘密结社研究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

①关于青帮内部神话传说的解剖与历史的还原, 见孔祥涛:《论罗教、大乘教的辈份制——青帮辈字由来考》,《清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②离卦教残经抄本, 下称《残经》。

③关于对八卦教历史与神话的解读, 见孔祥涛:《论八卦教历史神话——李廷玉故事》, 台湾《民间宗教》第 3 辑《中国近现代民间教门(妈祖信仰专辑》, 台北, 1997 年。

④如《薛刚反唐》等。

⑤如明万历三十四年《杨家将演义》等。

⑥ 清道光十五年重刻本《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卷》等。

⑦如明初《水浒传》等。

⑧如清代康熙年间《说岳全传》。

⑨此类作品不胜枚举。关于戏曲, 可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 天津市古籍书店, 影印本, 1992 年; 及《中国戏曲曲艺总目》各分卷。

⑩《三祖行脚因由宝卷》之《山东初度》部分, 光绪元年乙亥岁四月重刊。

11 以上故事基本取自记载西鲁番传说的现存最早抄本, 即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在广西武缘县所获姚大羔抄本《添弟会会簿》。西鲁故事全文, 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第 160—162 页。

12 青帮中流传的罗祖故事, 见陈国屏:《清门考源》, 古亭书屋, 1975 年。

13 明清时期西域反对明、清政府的叛乱, 参见《新疆地方史》,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五、六、七章。

14 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同光宣时期离卦教研究》, 1997 年, 南京大学, 未刊。

15《朱批奏折》, 福建巡抚富纲折,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4—449—2。

16《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郝硕折,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4—449—2。

17 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博恒理引用的李廷玉故事中, 李廷玉师徒平定了喀什噶尔的回部大叛乱, 参见 Porter, D. H. Secret Sects in Shangtu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7: 5(1886)。据查, 发生在嘉庆十九年以前的喀什噶尔回部大叛乱, 只有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的大小和卓叛乱。这次清军平乱是全国性重大军事行动, 所获胜利乃乾隆帝大肆夸耀的“十全武功”之一。离卦教最初创李廷玉故事时可能即借用了发生在乾隆三十七年八卦教大屠杀之前的此次“武功”, 以之粉饰刘佐臣及郜文生等人。后来随着咸同时期教派起义、反清情绪高涨, 为迎合反清需要, 又用比回部叛乱更为民众所知、在其身上更能找到“反清兴汉”共同点的吴三桂叛乱取代了回部叛乱。有关讨论, 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同光宣时期离卦教研究》。

18 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即下令镇压民间结拜兄弟会, 康熙三年、七年、十年又连连重申禁令, 并不断加重刑罚。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第 110—111 页, 第 122—123 页。

19 关于万提喜创会前闽台粤等地结拜兄弟会的反清斗争和万提喜死后乾嘉时期林爽文等天地会起义, 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

20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中华书局, 1987 年。

21 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 学苑出版社, 1993 年, 第三章、第七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22《军机处录副奏折》,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见《天地会》(七) 第 528—533 页。

23《外纪簿》, 闽浙总督伍拉纳等折,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见《天地会》(七) 第 523 页。

24《天地会》(一),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第 112 页。

25《天地会》(一),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第 97 页。

26《外纪簿》, 闽浙总督伍拉纳折,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见《天地会》(七) 第 525 页。

27《都穆游嵩山记》,《嵩山志》卷三。

28《军机处录副奏折》, 江西巡抚先福折, 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第 157 页。

29《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 中华书局 1981 年至 1986 年出版。

30 事例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第 113、118 页。

31“天地会的创立是取自《水浒传》的理想社会的。它建立了一个‘百万兄弟俱姓洪’、‘洪家兄弟四海通’的洪门组织, 实行了平等共和的体制, 当发动起义时, 还用《水浒传》来鼓动。而清朝统治者和反对革命者则用禁毁《水浒传》和反《水浒传》的《荡寇志》来对抗天地会的起义, 可见《水浒传》对天地会的关系是至深至大的。”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会党史研究》, 学林出版社, 1987 年。